

東亞與世界史

[日本] 羽田正 (撰)

孟明銘 (譯)

雖說標題講的是“東亞”，但還是請允許我從“伊斯蘭世界”這個概念開始講起。我在 2005 年出版的《伊斯蘭世界的創造》（中譯本《“伊斯蘭世界”概念的成立》，朱莉麗、劉麗嬌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一書中，論述了當今被廣泛使用的所謂“伊斯蘭世界”這樣一個空間概念是如何成立和展開的。十九世紀的西歐知識分子，已經逐漸具有強烈的“歐洲人”這樣的空間概念上的身份歸屬感，“伊斯蘭世界”一詞，也就是基於這種思維邏輯，被他們創造出來並使用的。在此之前，雖然已經存在著同樣是作為與“歐洲”概念相對應的空間概念，比如說“東方”或者“亞洲”這樣的詞彙，但“伊斯蘭世界”這個概念與它們相比，明顯是更加強調了在“宗教與世俗”方面，歐羅巴文明與伊斯蘭文明的區別，這點還是引人注目的。這當中體現出如下一種企圖，即要把“歐洲”樹立成克服了舊時代的宗教因素而完成世俗化的正面榜樣，而“伊斯蘭世界”則依然是被愚昧的宗教所束縛的負面典型。

但另一方面，“伊斯蘭世界”這一概念一旦開始使用後，在穆斯林知識分子當中，也出現了積極利用這一詞語來強調團結統一整個伊斯蘭社會的思想家。具體情況在這裡雖然不能詳細說明，但“歐洲”與“伊斯蘭世界”這兩種世界觀的相互對立，直到 100 年後的當代世界，仍然是存在的。在西方國家中，有人使用這兩個概念來強調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區別，而穆斯林主義者也同樣利用其來號召穆斯林團結起來反對西方文明，對此大家應該是非常清楚的。

在這裡想特別促請大家注意的是，在近代歷史學誕生和發展的 19 世紀到 20 世紀上半葉，“歐洲”和“伊斯蘭世界”這樣的概念被“發明”後，一直按照既定的軌跡發展，出現了對“歐洲”、其次是對“伊斯蘭世界”的歷史進行專門研究的學者，他們對於這兩個世界過往的歷史，分別進行了解釋和說明。其效果不僅僅在於瞭解歷史，更重要的是，這兩種“空間概念”（也可以稱為“地域概念”），逐漸地實體化了。也就是說，在一般人的觀念中，它們已經成為現實中本就存在的事物。歷史學家怎麼可能會去研究不存在的事物呢？

正如此，當我們採用歷史敘述，對某個空間或者地域的過去進行通史性質的描繪時，實際上就在為這種空間和地域的實體化，或者說現實化作出貢獻，這在先前的歷史當中是沒有過的。這裡我要著重指出的是，儘管前文中指出：某個空間被“發現”之後，其歷史才會被研究和敘述。但這類行為背後，應當有著某種時代訴求或者（廣義上的）政治必要性。

因為與上文的論點相關，在這裡我還想確認一下“通史”的作用。就通史而言，有著將其描述對象實體化、現實化的效用。如果某位歷史學家想要撰寫某個國度或地域的通史，就等於是在

宣稱這個國度或區域從古至今都一直存在著，是一種明顯的政治行為。例如，如果歷史學家所作通史的描寫對象是“日本”、“中國”這樣的民族國家，那麼他就是在為這個民族國家的實體化和基礎強化作貢獻。如果對象是“歐洲”、“伊斯蘭世界”、“東亞”這樣的地域概念，那麼效果也是一樣的。除了通史以外，以在當下存在的國度和地域概念為前提，對其過去歷史的某個方面進行解釋和敘述，也能起到同樣的效果。正如前文所言，這些都算是明顯的政治行為。歷史學家們在這些事情當中肯定都有著充分的自覺。

但我在這裡並不是想說，歷史學家必須要“去政治化”，而是希望歷史學家應該牢記自己身上存在著明顯的政治屬性。在這一點上，最近我在葛兆光教授贈於我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英文論文 *The "International Turn in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East Asian /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East Asia / China- A Response to Prof. David Armitage* (《“思想史的國際轉向”與東亞或中國思想史研究——對 David Armitage 教授的回應》) 當中，也找到了共鳴之處。葛教授對於自己所經歷過的政治體驗和立場有著清醒的自覺，也因為這點，使他認為有必要研究“中國”這一概念的歷史和敘述形式。

因此，作為一名對於這種政治存在有著自覺的歷史學者，我認為在現代世界有必要實體化的，是所謂“地球”這樣的空間概念及其歷史解釋體系。在當今世界，包括環境、經濟、信息情報、政治等差不多所有的領域都出現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如果全世界的人們不能擁有強烈的“地球人”這樣的歸屬感，互相幫助、共同合作面對這些難題的話，恐怕是沒有其它出路的。因此必須儘快使“地球”這樣的空間概念實體化、現實化，為此，必須要建構新的世界歷史體系，將之作為理解“地球”概念的敘述框架，喚起人們的“地球市民意識”(在英語表達中，*transnational citizen* 這個詞我認為最接近我的本意，另外像 *global citizen* 這樣的詞彙，大概也不會讓人誤解)。在日本，直到最近，我感覺仍然是將各國家各地區的通史分開來寫，然後彙編成一套世界史，這類世界史能順利地喚起民族意識，但卻難以產生“地球市民意識”。

如今我在構想新的世界史之際，在使用舊有的諸如“地域”這樣的理念框架和場所時，不得不採取十分慎重的態度。因為從廣泛的意義上講，人們在“發現”或“創造”這些概念框架時，必然會導致某種有著與他者相區別的政治意圖摻雜其中。如果各位能想到，被批判的“歐洲中心史觀”的根本問題，就在於其局限於“歐洲”這一概念，並將之與“非歐洲”對立區別開來，恐怕就此也能理解我的擔憂了。

當然，我並不是主張地球上的人們就應該只能擁有單一的“地球”歸屬意識。人擁有對於自己所居住的町、縣、國、地域等的歸屬感，這是理所當然的事，以此撰寫相關歷史也是無可厚非的。但是，光是這樣還是不夠的。我認為，有必要在這多重歸屬意識內加入對“地球”的歸屬意識。所謂新世界史的構建，同“地球”歸屬意識的獲得與強化，有著不可分的關係。

為了能實現這種新的世界史敘述方法，該採用何種具體措施，此處不再贅述，另找機會詳細討論。在這裡我就大致提出三個我認為比較重要的觀點：(1) 對歷史敘述的主體，不應該採取固定的、二元對立的方法進行研究；(2) 應當關注隨著時代變遷而發生變化的人類集團、國家、地域之間的相互關聯性；(3) 在各個歷史主體的敘述當中，特別關注它們相互之間的共通點。

接下來，我就要談到“東亞”這部分的內容了。不用說，“亞洲”這個詞語，並不是由在這裡居住的人發明出來的。它是 16 世紀“歐洲”人為了在地理上認識世界，將世界版圖劃分為五個部分後的產物。最早在 1602 年，利瑪竇在北京刊行了《坤輿萬國全圖》，將“亞洲”這個詞

語使用漢字“亞細亞”來表達。到了 18 世紀初，日本列島的知識分子也逐漸開始知曉這個詞。關於作為地理區域劃分的“亞洲”概念在後來為中國所接受的過程，董少新教授已有論述。

本應只是地理名詞的“亞洲”概念，在後來被歐洲人以及認同“歐洲”概念的人添入了諸如“停滯”、“封建”、“專制政治”等種種負面價值觀，成為與“正面”的“歐洲”概念相對應的“負面”空間概念。但另一方面，“亞洲”的人們也如同前文提及的“伊斯蘭世界”的故事那樣，積極使用“亞洲”這個詞語來對抗“歐洲”，並嘗試確立自己的主體性。

“東亞細亞”或者說“東亞”這個詞彙，是日本於 1880 年代後半段“發明”出來的。接著，在 1930 年代到 1940 年代前半期，作為支撐大日本帝國海外擴張的意識形態被廣泛使用，具有極強的政治意味。關於“東亞”、“大東亞”這樣的地域概念，至今已經有許多的專門研究論述。但這裡要提到一點，就是 1942 年，在當時日本文部省教學局的策劃指導下，東京大學、京都大學的歷史學家們編寫了《大東亞史概說》一書，嘗試使用歷史學方法來將“大東亞共榮圈”實體化，這就很值得我們關注：政治經常會憑藉歷史來達到它自己的目的。

我在上文所舉的《伊斯蘭世界的創造》這部書裡就詳細談到：與“東亞”概念一樣，在 1930 年代到 1940 年代的日本，出現了“回教圈”這樣的地域概念。其研究也同樣得到獎勵，並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此類研究，和當時日本政府及軍部出於世界戰略的考慮，對中國北方和東南亞地區穆斯林居住區產生興趣這一點有著很深的關聯。如果沒有現實的政治、軍事及社會需要，伊斯蘭研究在當時根本就不會有好的發展。日本戰敗以後，此類研究幾乎完全中止的事實，就是最好的證明。

對東亞的研究也同樣如此，上述編寫《大東亞史概說》的計劃，同戰敗一起雲消霧散了。從當時的日本政治角度來講，東亞已經沒有什麼重要性了，作為當然的結果，東亞研究也就衰退下去。

當然，並不是說“東亞”的空間概念，在戰後的日本就完全消失了。例如，在 1958 年上原專祿編的《日本國民的世界史》當中，就設有“東洋文明的形成”一章。文中在談到中國、印度、西亞的歷史時，也屢次把包括日本列島在內的、以中國為中心的文明稱呼為“東亞”文明。之後直到現在，在日本的歷史研究當中，運用“東亞”這樣的概念框架發表觀點的論述還有很多。從學術上考慮，為了理解地處歐亞大陸東端的日本列島的歷史，是很難無視中國和朝鮮半島的動向的。這種情況下，為了能從整體上把握從中國大陸到日本列島這一空間區域，使用“東亞”這個詞還是比較方便的。而且這一空間概念，可以讓舊有的對於日本前近代史的閉塞理解，變得相對化、開放化，也使得學術界樂於使用它。尤其是日本的現狀已基本固定和確立下來，政府也不再像戰前那樣有著明顯的海外擴張的意願。此外，由於中日韓三國的政治制度有著明確的區別，“東亞”這樣的概念所包含的政治信息也相對而言不再那麼強烈了。我認為，二戰以後至 1990 年代冷戰結束期間的“東亞”概念和東亞史研究，其政治性已不再受關注，而應該是單純的學術議題了吧。

可是另一方面，除日本以外的東亞國家，對於由日本政府和知識分子主導的“東亞”概念卻有著很強的警惕感。2005 年，由日本文部科學省補助金贊助的“東亞海域交流和日本傳統文化的形成”大型研討會召開之際，我作為參與者之一，在對於“東亞海域”這個術語進行研究時，從中方研究學者那裡聽到了“日本文部省提供資金的真實目的究竟是什麼”這樣的議論。不過，參與共同研究的學者們最終還是確定了研究目的，即試圖證明日本文化絕不是單在本國內部形成

的，而是受到了中國大陸和朝鮮半島的強烈影響。

與日本相對照，中國學術界直到最近仍不怎麼使用“東亞”這樣的空間概念。關於這一點，最近由松浦正孝教授編著的《何謂亞細亞主義？——記憶、權力、價值》（密涅瓦書房，2013年）一書中所收錄的孫歌的文章就指出：對於中國人而言，中國就是中國，缺乏“中國屬於東亞”這樣一種地理空間上的歸屬感。2009年我在復旦大學參加國際會議時，就聽葛兆光教授提出過，他在之後還幾次強調過這一點。在日本，人們常常將西洋和東洋相比較，而在中國則成了中國與西洋相對。我還知道有中國學者主張“中國的西部和南部分別與中亞及南亞國家接壤，不能被認為是一個單純的東亞國家”。當然，最近也出現了一些將中國作為東亞的一部分來對待的研究及成果，但總體上仍佔少數。今日中國所使用的漢語“東亞”一詞，並不是中國人創造出並用來表示歸屬意識的，我想大概只是對英語“East Asia”的翻譯。

那麼，現代英語世界所使用的 East Asia 一詞，又究竟表達了怎樣的意義呢？East Asia 這個詞是約 1950 年代末至 1960 年代在美國學術界傳開的。這主要是因為冷戰期間，美國開始從戰略上日益強調和重視所謂“地域研究”的緣故，這一點應該沒錯。在此之前，很多大學都是在以往的“東方學研究”體系中教授漢語和日語的，專門使用“東亞”這樣的空間概念還沒有過。在這裡可以試舉幾例：耶魯大學“東亞研究委員會”是在 1961 年設置的；哥倫比亞大學到 1962 年改組設立了“東亞語言文化系”；普林斯頓大學則到 1969 年才將“東方學部”拆分，單獨設立了“東亞學系”。這些做法，都有著將作為人文科學的中國、日本研究與作為社會科學的現代研究相結合來進行地域研究的企圖。而美國的地域研究，又有著很強的政策研究色彩。不過，話說回來，“東亞”這個概念，本來就是一個帶有很強政治意圖的空間概念。

到了 1990 年代，隨著冷戰的終結和中韓兩國經濟實力的崛起，“東亞”這個概念又有了謀劃“東亞共同體”的目標意識，其重要性急劇地增加了。如今，中、韓、日三國同屬“東亞”的思想開始多了起來。不用說，此種“東亞”的地域概念也仍然是依託某種政治意圖創造出來的。韓國在 1990 年代以後很快活躍起來的“東亞論”（儘管其內容十分複雜），就和這種試圖建立“新東亞”體系的想想法有著很深的關係。中國目前流行的“東亞”論，也應該出於這同樣的原因吧。

正如此，“東亞”這一空間概念，由於講述它的人、國家乃至時代的不同，其意義也不斷發生著變化，有著極強的政治含義在裡面。當我們在使用這個詞語來表達時，一定要充分意識到這一點。“東亞”可能會和“歐洲”、“伊斯蘭世界”這樣的概念一樣，為歷史所實體化，成為具有排他性的空間概念，我們必須認真對待。我堅信，在當今應當儘快被實體化的概念，應該是“地球”這一概念。要是仍然有著排他性的空間概念存在，雖然說也算是理所應當的，但對於新的世界史來說並不是好事。因此，在構建新的世界史之際，對於“東亞”這樣的空間概念的使用應該十分慎重才行。

作者簡介：羽田正，日本東京大學副校長、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

譯者簡介：孟明銘，復旦大學歷史系博士生。上海 200433

[責任編輯 陳志雄]